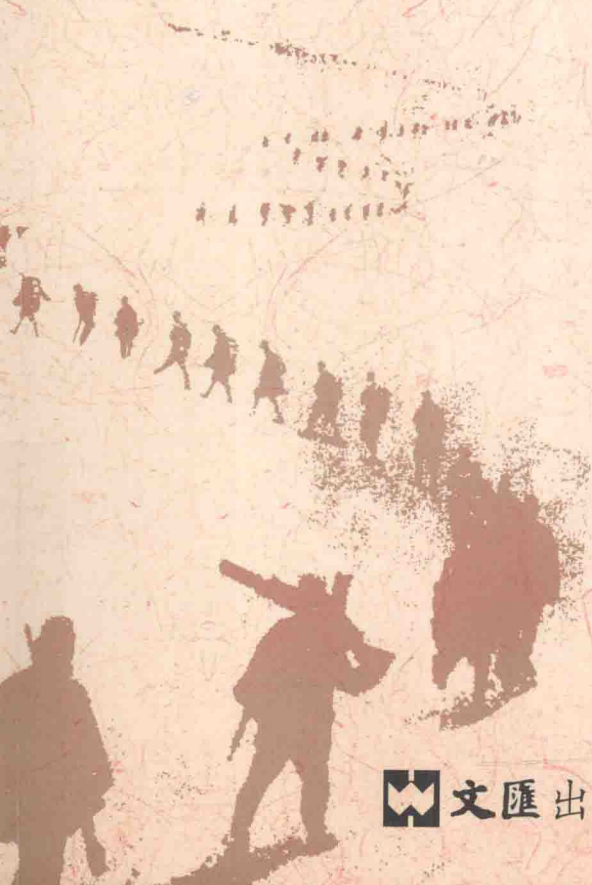


蘇州
小平同志
新法主人
勿外周遊
平第
秋石

绘得红楼铸青史

秋石◎著



 文匯出版社

绘得红楼铸青史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绘得红楼铸青史 / 秋石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 - 7 - 5496 - 0765 - 5

I. ①绘… II. ①秋…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
文学史研究 IV. ①I209.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6086 号

绘得红楼铸青史

作 者 / 秋 石

责任编辑 / 甘 棠

封面装帧 / 王铁民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450 千字

印 张 / 31.25

印 数 / 1 - 3000

ISBN 978 - 7 - 5496 - 0765 - 5

定 价 / 48.00 元

关于“扬军抑红”错误倾向我的 第五次检讨和谢忱 (代序)

根据巴金先生倡导的讲真话精神，借本书出版之际，我再一次对自己在2000年前专项研究中所持的“扬军抑红”错误倾向作检讨，这也是我在同一个问题上的第五次检讨。我前四次检讨，分别是在2000年3月28日文艺报社在北京为拙作《萧红与萧军》（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举行的研讨会之后；2001年9月在哈尔滨举行的纪念萧红90诞辰研讨会上；《萧红与萧军》一书修订本《两个倔强的灵魂》（作家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代后记《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呼兰河的女儿——献给萧红百年》一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代后记《我这三十年学者梦》；以及2014年11月23日在上海举行的第十一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等。此外，于京、沪、杭、穗等地同一些前辈学者的沟通中，我也多次予以深刻反省，警钟长鸣。

萧军是我文学道路的引路人，我对萧军的感情是比较深的。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始朴素的感情，一度使得我在二萧研究中失之偏颇，即过于站在萧军一边，疏于考证比对，产生了不该出现的扬军抑红的错误倾向。如对文坛头面人物周扬和萧军的“情敌”端木蕻良的评判，我多是以萧军这边的人划线，有失公允和宽容，有些描述，甚至还带有一些脸谱丑化色彩的攻击性。实践证明，这种倾向十分危险，缺乏一个学术工作者起码的道德水准



和学术素养。这些问题的存在,在1999年12月出版的《萧红与萧军》一书中尤为明显。至今,我深为内疚。把自己深陷进上世纪三十年代前辈们的恩恩怨怨中,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在2000年3月28日由《文艺报》主持召开的《萧红与萧军》一书研讨会上,一些学者、专家就该书存在的严重缺陷,毫不留情地向我提出了尖锐批评。我还注意到:“左联”老战士、萧红生前好友、86岁的梅志先生虽然到了会,但她始终不发一言。尽管会议主持人恳请她提出批评,但还是被她婉拒了。要知道,她是全体与会者中唯一一位历史现场见证人哪!在上海,在鲁迅身边,可以说她是萧红的唯一女性知己;在武汉,她见证了发生在二萧身上的一切,以及“第三者”的悄然介入;在重庆,虽然与萧红接触少了,但她是唯一一位窥出萧红内心深处最终情感所在的女性……研讨会结束的次日,我专门去木樨地24楼她的府上听取意见。对于我的前来讨教,梅志前辈爽直且又十分严厉。

继梅志之后,另一位远在长春寓所的历史见证人蒋锡金先生(当年,在二萧初抵武汉时,他给予了这对患难夫妻及时而宝贵的帮助。后来,二萧西安分手后萧红回到武汉,在端木蕻良独自一人去重庆后,又是蒋锡金给了萧红无微不至的关怀,并亲作担保,为她筹足了去重庆的旅费及到重庆初期的生活费用)在电话中,也对我发出了同样的严厉批评,批评我存在着严重的扬军抑红倾向,并语重心长地告诫道:“分析具体的人和事,尤其是对有争议特别是争议很大的事件,一定要学会全面观察问题。……我们是在写历史,写历史是在为历史上的人和事作证,如果这中间掺杂了私人情感,就会产生不公正,就会误导后来人。所以,一定要注意求证,而且是小心谨慎地求证,求证之后才是实事求是地作结论,力求恰如其分!”

2000年3月30日,亦即《萧红与萧军》一书研讨会举行后的第三天,多次扶携我的革命前辈、著名诗人、上世纪50年代担任萧军部分作品责任编辑的原《新文学史料》主编的牛汉先



生,在其朝外十里堡寓所也向我提出了类似的中肯批评。牛汉先生对我甚是负责,在研讨会上并没有说我的好话。在发言中,他以另一种方式,不动声色地批评了我的错误倾向。他说,为人物作传,不可能把一个人的所有方面都写全。这是一个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任何一个人都有他们生活的那段历史,对他们要进行历史性的理解。作传要写出一个人一生的主要成就,如作家就要把他作品的艺术个性、他的成长历史介绍出来。但是要是把生活细节全部抹掉了,只剩下概念的东西,那也是不丰满、缺乏血肉的,因而也是不完美的。

我衷心感谢众多的前辈及时地为我敲响了警钟。他们的批评,我都一一铭记在了心中,在随后出版的《两个倔强的灵魂》一书中,作了脱胎换骨的改正,包括对萧军的“论敌”周扬先生,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尤其是周扬晚年震撼中外文坛的深刻觉醒与反思。而在2012年初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纪实《呼兰河的女儿——献给萧红百年》一书中,则有了新的提升。

今天,面对本书的读者,我再一次对过去二萧研究中存在的“扬军抑红”错误倾向进行深刻反省。这也是十多年来我反复阅读巴金先生《随想录》的最大收获。

在过去36载左翼文学的研究生涯中,我有幸与两位鲁迅学生、30余位左翼作家左翼文化人,上百位老红军、老八路、新四军老战士(含“皖南事变”幸存者),以及经受了严峻考验的地下党老前辈相识并近距离交往,自是受益匪浅。受他们的熏陶,我不避讳我是左翼,一个敢于亮剑,痛批左与右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左翼作家左翼学者。还要声明的一点是:我对文化大革命持否定立场。我绝不会与极左为伍,永远不会。对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反右扩大化与“文革”,我一直持鲜明的批判立场,而且从未改变过。但,毛泽东同志没有说过的话,没有做过的事,决不允许别有用心地捏造、抹黑,也决不允许拿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来否定毛泽东同志为中国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决不允许否定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历史。

目 录

代序：关于“扬军抑红”错误倾向我的第五次检讨；关于我的

属性自白 (001)

王洛宾的音乐人生 (001)

王洛宾早年崇尚西洋音乐，并深得外籍名师点拨，他也一直热切地向往着能去闻名全球的巴黎歌剧院深造。他为什么会半途折向西部民歌世界的漫漫探索之路，纵是无尽的囚狱也无法阻挡住他对西部民歌的苦苦追求？改变他这一命运的，又是怎么样的一位“大师”？

《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原型、藏族少女卓玛，现实中确有其人吗？……

王洛宾逝世以来，在台湾至内地，不断有人撰文质疑，指责在台湾女作家三毛自尽问题上王洛宾“作秀”、“胡编”……在此，笔者受王洛宾之子王海成先生委托，向读者们公布一封三毛亲笔写就的信，内中是非曲直，相信读者们读后自会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距今整整半个世纪前，越南人民领袖胡志明在接见前来慰问演出的新疆军区文工团演创人员时，突然问道：“《在那遥远的地方》作者来了没有？”胡志明主席是怎么知道《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的作者名字的？而其时的王洛宾又身处一种什么样的境地？

我是“托匪”？ (069)

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理论家发起的批判“自由人”胡秋原、又牵扯出对“第三种人”苏汶、“小资产阶级作家”杨邨人的批判。虽然这个批判运动被当时中共领导人及时制止，但由于极“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这个事件实质上并未得到真正的纠正，以致于1950年代以后的现代文学史的教科书、以及相关学术研究中，始终把左联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作为正面的事件去宣扬，对于批判中受到伤害的胡秋原、苏汶、杨邨人等人也缺乏客观的评价，连2005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的有关注释，依然对受害者作了不公正的介绍。现在秋石先生的这篇长达六万多字的论文，



对当时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领导人受到的“左”的路线影响,对于胡秋原的不公正批判,尤其是污蔑胡秋原为“托匪”的事件,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和反思,清算了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左倾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节选自陈思和先生在《史料与阐释》上刊登本文时所做的卷头语。我们使用时,做了删改)。

我愿在墓中面向东方 (137)

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是不朽名著,而他的妻子海伦的写作亦应当有她自己的地位。他们为介绍中国所作的贡献,应该得到一视同仁的认可……每一所大学,每一位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革命早期艰苦岁月的人,都应当学习她的著作,学习她丈夫的著作。

《活的中国》:他们让世界知道鲁迅 (171)

1936年5月,在姚克陪同下,鲁迅先生在家中亲切地接待了斯诺先生,同其进行了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谈话。在这次长时间的晤谈中,鲁迅先生详尽地回答了斯诺先生提出的有关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系列问题。此外,斯诺还与姚克通力协作,将鲁迅及中国左翼作家的代表作源源不断地介绍给西方世界的广大读者,其经典之作是迄今仍在熠熠闪光的《活的中国》……

“望乡之星”绿川英子 (186)

抗日战争胜利后,牢记周恩来嘱托的绿川英子没有回国,毅然随夫奔赴我东北解放区,以忘我的热忱投入到中国人民埋葬蒋家王朝、建立人民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去。不久,在一次手术中因细菌感染不幸逝世,年仅35岁。逝世后,她与稍后不多日逝世的丈夫刘仁一起,被我东北行政委员会追授为烈士。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亲自为中日合拍的反映绿川英子刘仁夫妇生平业绩的电视剧题写了“望乡之星”的片名。1983年夏,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佳木斯市人民政府为绿川英子刘仁夫妇重新修建了合冢墓陵园。

抵抗日本侵略的文学上的一面旗帜 (201)

从萧军接待到访的“抗联”负责人关于抗击日寇英勇业绩的讲述伊始,直至最终在鲁迅的亲切关怀下《八月的乡村》一书问世;作为其伴侣、战友的萧红,不仅先于萧军创作出了与《八月的乡村》相媲美——被鲁迅热烈推颂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的中篇小说《生死场》,自始至终见证了《八月的乡村》诞生的全过程。而且,正是萧红以其女性特有的关怀体贴和协助,且力阻陷于焦躁中的萧军将书稿付之祝融的鲁莽行动,才有了日后这部蜚声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坛的辉煌作品。

关于萧军第一次抵达延安的一些情况 (230)

萧军刚到延安不久,这也看不惯,那也瞧不顺,乃至吼着要回国统区



去,并张口向党中央借2万元边币作一应费用。明知边区财政经济处在极度困境中的中共首脑毛泽东回答:不用说借,拿去就是了!要知道,在此前一年由周扬、成仿吾、丁玲、萧三他们发起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全部开办费用也才2万元!后来,当萧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首日继毛泽东作完引言后第一个发言,无视会议宗旨,口吐狂言,说他的一支笔要管两个党,要和共产党平起平坐,要批判所谓共产党的“三风”“六风”等……而毛泽东听了,居然会不急不恼不申斥,甚至连个轻描淡写的批评也不作一个字。这其中,恐怕不能单纯地以萧军是鲁迅学生这一身份来诠释这一现象。

萧军与王实味事件 (244)

萧军与王实味素昧平生,直到后来在未经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王实味被错误处决,萧军与王实味只说过几句话,不存在“同党”或“托派嫌疑”的问题。然而,由于萧军生性秉耿,对一些不良现象易激动而仗义执言,尤其是对批判王实味的过程中出现的缺乏民主和实事求是的过火行为,一再表明自己的鲜明立场,因而受到株连,招致了一系列的麻烦和痛苦。最终,仍是伟人加友人的毛泽东替他解了围。

巴金与萧军 (261)

巴金与萧军,无论在人的性格、志向,还是在作品的风格、取向上,他们间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关于“革命”“理想”“信念”方面,巴金崇尚的人文理想之依托是无政府主义,他崇尚讲真话、为人民,一生低调为人作文;萧军也有理想、信仰,不过年轻时的萧军有着“野气”,行为方式多欲以一种先觉者、引路人的身份去实践,在其延安写的日记内容就有不少的夸大个人作用或失实之处。萧军是鲁迅的学生,他对鲁迅的炽热情感是其他人所无法比拟的,他交人视友是以对鲁迅尊重为底线与特定基准的,他晚年时向家人郑重嘱托“钟爱鲁迅”;巴金并非鲁迅的嫡传弟子,但他把自己看做是鲁迅的后辈、学生,他对鲁迅的情感表面波澜不惊,实则深蕴。在对待后学和晚辈问题上,巴金与萧军都是鲁迅精神的传承者,他们都将鲁迅一以贯之的关爱和扶掖青年人的风范真正去发扬光大。

生死一场凄绝中 (289)

萧红在香港生活了整整两年之久,最终因贫病交加,不幸逝世于业已遭日寇铁蹄践踏的香港。

从铁蹄践踏下的伪满洲国都市哈尔滨逃脱出来,却又惨殁于旋遭日寇铁蹄践踏下的昔日殖民地乐园的香港,难不成,这是她的命中注定?

她的香港之行的目的,既是为谋得心中渴望已久的一片世外桃源,更是为了躲避由婚变导致的无处不在挥之不去的那些“流言蜚语”。但



她的此次香港之行，却是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她的短暂的一生，无时无刻不在追求自由、幸福和爱情。但现实中的一切，似乎又离得太远太远，越来越无法实现……

在《萧红的第一个恋人》的背后 (368)

那个给萧红造成了一生都难以治愈的伤痛的第一个男人，抽大烟成瘾、终日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汪恩甲，与萧红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爱恋”……可《萧红的第一个恋人》的作者，却偏偏要在这上面大做特做文章，居然别出心裁地给做成了“温馨的两人世界”！

追寻任正真 (393)

除狂飙社老将高长虹外，延安文艺座谈会还有没有领了请柬而没有出席的呢？

《杨家岭夜话》一共写了两个人，一个是当年延安人所尽知的毛泽东，一个是颇有个性知识分子任正真。

在经过长达三年并非徒劳无益的努力之后，我才明白：追踪那个历史上一向沉稳低调的舒群，本身要比追踪任正真更具故事情节和历史意义。至少，使昔日东北作家群的名符其实的领头雁悄悄地浮上了水面……

驰骋二战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 (427)

萧乾于1939~1946年应邀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讲师，同时兼任《大公报》驻英国特派记者。时值二战爆发，他以战地记者身份驰骋欧洲战场，亲历了伦敦夜晚大轰炸的惨烈、诺曼底登陆、美军第七军挺进莱茵河、波茨坦会议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以及联合国成立大会等传奇般的历史时刻；并于战争结束前后三次进入德国采访，是经历欧战全过程唯一一位中国派驻记者，由此发表了上百万字的以战地见闻为重的新闻和纪实作品。

把“人”字写端正些 (441)

“在我的文学生涯和生活中，胡风都给予了热情的扶植和无私的帮助，这些，我都是永远感激和难忘的，我之所以成为这个人为认定的‘集团’的骨干，完全是由于我与胡风之间的、在患难中建立的深厚的友谊关系。我与胡风的感情，主要是出于友谊以及对朋友忠诚这一古老的中国人的为人道德。”

他更是一位严谨正直的文史学家 (465)

因了荣膺马其顿共和国作家协会授予的国际性文学奖“文学节杖奖”，牛汉先生被看作是继艾青之后最具盛名的中国诗人之一，但是以我同他之间26年的交往，更愿意将他看作是一个一生讲真话，严谨的，有着历史凝重感的文史大家。

代后记：他们都是值得我们讴歌的前辈 (485)

王洛宾的音乐人生

王洛宾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出类拔萃的情歌圣手，而他个人的真实

爱情尤为可歌可泣。

作为一名音乐家，他

是人所景仰的大师；

作为一个男人，他是

铁骨铮铮的硬汉；作

为丈夫，他是一个坚

贞不渝、有血有肉、

有情有义、可亲可敬的真情男子。

王洛宾 (1913-1996)



——作者题记

1996年3月14日凌晨零时四十分，王洛宾老人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83岁的王洛宾老人的离去，并不意味着一代歌王时代的最后谢幕。恰恰相反，王洛宾的音乐犹如一坛窖藏了百年的老酒，是那樣的甘醇久远；犹如施特劳斯笔下轻轻泻出的蓝色多瑙河，年年岁岁在环宇之中回荡着。王洛宾，那个蓄着山羊胡子，蒙着红布盖头的“新嫁娘”的小老头，始终在人们眼前晃动着。



泱泱华夏，古往今来，还没有一位民间音乐家，值得人们如此这般年复一年地回味着。王洛宾充满传奇色彩而又流离坎坷的一生，不啻是一部充溢着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的人生大书，准确而又完整地诠释这位老人凝重浪漫的人生情怀。

俗语说，逝者为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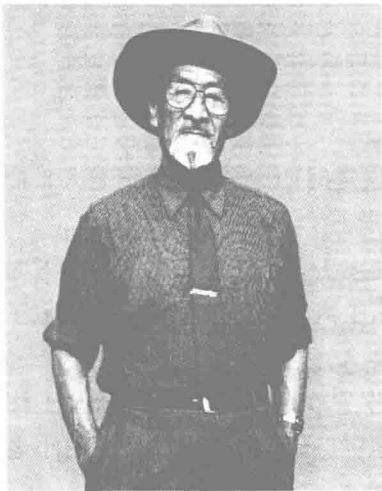
然而，王洛宾逝世二十年来，却几乎不曾享受过一天的安宁。

就在他的歌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洋人纵情演唱的同时，有关他个人的一些传闻，也被人们经意或者不经意地给演绎着，有的甚至以讹传讹，给演绎成了另类“经典”。

作为一个热爱王洛宾，且与其至爱亲朋一直保持着联系的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文化史研究者，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向世人澄清一些有关王洛宾先生鲜为人知的事情，以正视听。

王洛宾早年崇尚西洋音乐，并深得外籍名师点拨，他也一直热切地向往着能去闻名全球的巴黎歌剧院深造。但他却半途折向西部民歌世界的漫漫探索之路，纵是无尽的囚狱也无法阻挡住他对西部民歌的苦苦追求。改变他这一命运的，又是怎么样的一位“大师”？

《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原型、藏族少女卓玛，现实中确有其人吗？时至今日，还有人能以自己的亲历亲见来印证王洛宾当年创作这首脍炙人口的世界名曲的全部经过吗？



王洛宾逝世以来，在内地至台湾，不断有人撰文质疑，指责在台湾女作家三毛自尽问题上王洛宾“作秀”、“胡编”……内中是非曲直到底是怎样的呢？

距今整整半个世纪前，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在接见前来慰问演出的新疆军区文工团演创人员时，突然问道：“《在那遥远的地方》作者来了没有？”

胡志明主席是怎么知道《在那遥



远的地方》这首歌的作者名字的？面对胡志明主席这一满含深情的发问，新疆军区文工团领队又是如何作答的？而其时的王洛宾又身处一种什么样的境地？

笔者愿借此文，力求给出一个比较准确完整的答案。

小说谱曲第一人

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是著名作家萧军的成名作。作品直接描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同日寇法西斯入侵的斗争，是世界上最早的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的作品之一。加上鲁迅亲为作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更是熠熠生辉。然而，几乎所有的读者在解读这部战争题材的作品时，似是都忘记或忽略了这部通篇充溢着你死我活枪林弹雨的小说中，嵌有一首音乐插曲。人们更是有所不知，这首向侵略者发出呐喊与声讨的歌曲作者，竟是后来名震中外的西部歌王王洛宾！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没有人知晓这首歌的作曲者，直到45年后的某一天，云开雾散，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的《八月的乡村》一书的末尾，附录有这首题为《奴隶之爱》插曲的完整歌谱。这首《奴隶之爱》正式署名为：萧军词，洛宾曲。在歌页的下端，还有萧军亲自拟就的一段“附记”。

附记：此曲由王洛宾同志所作，由于过去种种原因只能用L·P来代替。最近在北京时经四十余年我们又见到了，得知他和我全属一切“清白无辜”，就把他的真实姓名也“露”出来吧！

萧军 1980年5月21日

附带说一句，王洛宾在《奴隶之爱》的“露”名，要比经典名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正式取消“青海民歌”的代名词，而恢复“词曲者王洛宾”的历史本来面目，要早8年。

1935年7月，“不容于中华民国”（鲁迅：《八月的乡村·序》——秋



石注)的抗日武装斗争小说《八月的乡村》在历经挫折后,在鲁迅的亲切关怀下于上海出版,与叶紫先期出版的《丰收》,以及稍后一些时间出版的萧红成名作《生死场》,同为“奴隶丛书”。鲁迅先生为三本书都作了序。在为《八月的乡村》所作的序言中,鲁迅充满激情地写道:“这八月的乡村……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正是由于鲁迅这一独特视角的强劲推介,书一出版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很快,便流传到了大战在即风雨飘摇的前沿阵地北平,并且最先在失却家园流浪到北平的东北大学学生中广为流传。当时由于媚日反共当局的封锁,一般人不易获得此书,“东大”学生便经常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集体听读。此时的王洛宾已经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一年多,在“东大”临时驻地附近的西直门外扶轮中学当音乐教师。扶轮中学离游泳场不远,酷爱游泳的王洛宾经常在游泳场与“东大”学生们相遇,于是,他也加入到了集体听读《八月的乡村》“东大”学生行列。这一天,“东大”学生朗读的正是《八月的乡村》中有关“厚嘴唇说话了”的那一章节。小说的主人公萧明与安娜热烈地相恋着,然而,活生生的现实,武装抗击入侵者的紧张与残酷,革命军队铁一般的纪律,却绝对不容许他们儿女情长,卿卿我我。正是在这种极端矛盾而又痛苦心理的猛烈冲撞下,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公安娜悲愤地唱道:

我要恋爱!

我也要祖国的自由!

毁灭了吧? 还是起来?

毁灭了吧? 还是起来?

奴隶没有恋爱;

奴隶也没有自由!

遇到这样的情节,作家只能用文字来表达。而再精彩华丽的词汇,也远远比不上音乐大师用音乐来烘托气氛。听着,听着,被这段情节描写激荡着的王洛宾再也不能单纯地跻身听读的人丛,而是浑身充溢着汹涌澎湃的音乐浪涛,无法遏制,无法宣泄,他要冲决,他要暴发,他要吼唱!



5·655——1,一个八度跨音,喊出了“我要恋爱!”势如破竹,接连几个“三连音”,铿锵有力,倾吐出奴隶的抉择!

这是年仅23岁的王洛宾大学音乐系毕业后一次极为成功的创作尝试。这成功的尝试使他成为中国小说史上谱写插曲的第一人。他又回到了悲愤的“东大”学生中,但他不再只是一个《八月的乡村》的听众了,而是成为了该书作者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很快,歌曲由失却家园的东北大学生们高唱着,传遍了祖国大地!

说到王洛宾同流亡在北平的东北大学学生的相识相交,及至最终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谱曲一事,内中,还隐藏着一个颇有民族气节抵御外侮的动人故事呢!

1985年12月1日,已有西部歌王誉称的王洛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提到1936年夏天在扶轮中学当音乐教员时,他每天骑车去动物园后边五塔寺里吊嗓子。一日顺着河往西走,看到河南岸有一群人在争执。“我停下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日本人和两个朝鲜人在老乡的养鱼池里钓鱼,老乡再三央告,三个浪人根本不听。”王洛宾回忆道,这条河有20米宽左右,王洛宾隔河喊话,叫三个浪人到河里来钓,告诉他们说养鱼池是老乡全家的生计。那个日本人回答说“你的过来”。王洛宾以为他们接受了调停,便绕桥转到河南岸去。不承想日本人突然砸了一块石头,幸好没有打中,“我随水冲了一下爬上岸,三个浪人又赶了上来。这时一个卖油炸糕的山东老人,把炸糕盘一甩,施起了援手。”

很快,养鱼池的一个年轻人也加入进来,不到一分钟,山东老汉便把朝鲜人扭住双臂,按在了地下。而王洛宾则“我对付小日本,他几次想用头把我撞倒,每撞一下,我都扇他一个耳光。”……

其实,王洛宾痛打欺压中国乡民的日本浪人所显示的民族仇恨与民族气节,早在少年时代就在心底滋生了。据王洛宾之子王海成先生2015年3月27日,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向笔者复述父亲生前讲过的一则故事:还是在上世纪20年代的那些年间,时名王荣庭的少年王洛宾,从位于所居住的东城牛角湾艺华胡同的家,前往位于和平门附近的京师八旗子弟高等小学堂上学,若走近路的话,则要经过各帝国主义列强使领馆林立的东交民巷。中国人穿越这条东交民巷,需要向驻守在那里的



洋巡捕低头鞠躬。倔强的小王洛宾宁肯绕行上一二里地，也绝不愿向那些外国巡捕低一下头。

就在痛打日本浪人的当天下午，王洛宾换了衣服去学校给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上音乐课。他把上午发生的事讲给学生听，大家起初是低声呜咽，后来又变为号啕大哭，课无法上下去了……相隔一个星期，又是初中二年级的音乐课，走进教室后，王洛宾感到特别的安静，四十几个孩子都瞪着眼睛望着他。他们的级长走到前面，郑重地说：“我代表全班同学，献给您一件礼物，并保证随时做您的后盾。”说着双手递过来一把雪亮的童子军狄刀。“我接了刀，哭了，这堂课又没上成。”

王洛宾与日本浪人之间的这场架没有白打，他不仅得到了学生们赠予的一把狄刀，而且还在高粱桥畔结识了许多东北大学的进步学生。王洛宾晚年回忆道：“我们一起游泳，一起唱歌，一起读小说，当他们读《八月的乡村》中安娜对尚明唱的那首歌时，我深受感动，立即谱写了曲子。”

这就是有名的《奴隶之爱》。

《奴隶之爱》成为奴隶们射向日本侵略者的一支利剑。

两年后，1937年的初秋，在“七七”事变的炮火声中，王洛宾加入了抗日救亡的行列。就在他逃出北平城，抵达千年古城河南开封，与新婚妻子洛珊一道，辗转向大西北进发的途中，他不止一次地在同行流亡的热血青年中听到这首由他亲手谱曲的《奴隶之爱》！

1938年初，他和洛珊还有幸坐进了贺龙将军的座车。在贺龙将军的亲切指点下，王洛宾、洛珊夫妇抵达晋陕交界处的万安镇，加入丁玲领导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在服务团驻地，一身戎装，被指点江山的毛泽东亲切地誉为“今日武将军”的丁玲，一边拍着王洛宾的肩膀，一边热情地拉着洛珊细嫩的手，连声说倒：“欢迎！欢迎！听塞克说起过你们，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我们都已听到了你为《八月的乡村》谱写的歌曲，大家都在唱！”说着，当场风趣地唱了一句：“我要恋爱……。”随后，丁玲将王洛宾分在歌咏组，同组的还有李劫夫和周巍峙，以及后来成为丁玲丈夫的陈明等人。洛珊则被分在了女子队。

不日，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移师临汾时，王洛宾欣喜地遇到了正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的《八月的乡村》作者萧军，以及萧军的妻子萧红等



人。一见面，俩人便情不自禁地紧紧拥抱在了一起。萧军感激地告诉他：还是在上海的时候，就有来自北平的“东大”学生给萧军演唱过由王洛宾谱曲的《奴隶之爱》。听后，萧军深感满意——自己在小说中未能充分表达的情感，一经谱曲就表达得酣畅淋漓。萧红也颇为感动地紧紧握住洛宾的手摇个不停。这位当时已经初享盛名的青年女作家，与众不同地穿着浅咖啡色的毛呢外套，头戴一顶俄国哥萨克式皮帽，脚蹬一双棕红色的小皮靴，亭亭玉立在清一色灰棉军装的人群中，自然而然地显露出她的超然不凡。

很快，战地服务团由临汾经乡宁撤往西安，执意要打小鬼子的萧军独自一人徒步北上，前往五台抗日前线。4月，没能去成五台抗日前线的萧军自延安来到西安，继而与另有爱人的萧红分手。

有关当年萧军与丁玲、王玉清、聂绀弩等人一起进入“西战团”驻地的情况，还是在王洛宾生前，根据王洛宾的亲口讲述并最后审阅通过，王洛宾挚友李桦先生写就的《西部歌王——王洛宾大写真》一书，为我们还原了历史上鲜为人知的这一幕。大致如下：

服务团全体临时住在西安莲湖公园旁的一所学校，大家都住集体宿舍。萧红当时……单独一个人住在楼上。

因为萧军不在，王洛宾间或上楼去看看萧红，问她有什么事需要帮忙；闲暇时就让洛珊（王洛宾爱人——秋石注）去陪陪萧红，尽一份朋友的情谊。

有天早晨，王洛宾正在学校操场上运动，听见有人喊：“萧军回来了！”王洛宾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兴冲冲地跑上楼去给萧红报信。他想给朋友送去一个突来的惊喜。

当他推开萧红单独居住的寝室，却看见端木蕻良在屋里，而且……

他极为扫兴，也有些怨愤，冷冰冰地丢下一句：“萧军回来了！”扭头就走。

他看到的这一幕，从来没有和萧军说起，他不忍心给朋友受伤的心里再撒上一把盐。但是，这一幕留下的阴影，特别是几年以后